

福柯与德里达

理性的另一面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同文馆·思想家对话丛书

〔英〕罗伊·博伊恩 (Roy Boyne) 著
贾辰阳 译
主编：周宪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主编：周宪

福柯与德里达

理性的另一面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英〕罗伊·博伊恩 (Roy Bovne)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8 - 34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英)博伊恩(Boyne, R.)著;贾辰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思想家对话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16685 - 7

I. 福… II. ①博… ②贾… III. ①福柯, M. (1926 ~ 1984) - 哲学思想 ②德里达, Y. (1930 ~ 2004) - 哲学思想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137 号

Roy Boyne,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ISBN: 9780044450849

Copyright © 1990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

著作责任者: [英] 罗伊·博伊恩 著 贾辰阳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6685 - 7/B · 08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158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福柯论疯癫	(5)
关于疯癫的政治经济学	(6)
文学和艺术中的疯癫	(15)
疯癫和科学	(31)
第二章 笛卡尔式排斥	(39)
福柯和笛卡尔	(46)
第三章 德里达与福柯	(54)
批判	(56)
福柯的回答	(72)
越界问题	(81)
第四章 文本和身体	(88)
解构主义	(88)
规训和惩罚	(107)
第五章 后等级政治学	(120)
德里达、福柯和马克思主义	(122)
女性主义与差异	(132)
种族与差异	(150)
结 论 差异与他者	(157)
参考文献	(161)
索 引	(167)

导 言

1

在很多方面,本书都颇似一个侦探故事。它试图对成型于 20 世纪既往年月中的社会揭示出一些东西。无疑,经验社会学家会吃惊地发现,此书没有考察诸如欧洲和北美洲的结构性社会变化,其研究重心反倒涉及疯癫的本质、监狱的产生、文本阐释问题、古希腊自我的本质,以及社会学、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理论化潮流的形式。但侦察过程并不总是明显的,在此案例中,它们导出了关于我们的当前和未来的几条假说,这些假说可能是很难通过其他的途径得出的。

故事始于一场学术辩论。1961 年,一位名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法国哲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疯癫历史的长篇论文。这一极具争议的原创作品,由于其不精确性、偏狭性、对大段历史时期的忽略,以及它的浪漫主义和箴言式的晦涩表述而开始遭到批评。但仅有一个批判性回应切实地击中了要害。它于此书初版发行两年之后,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口头陈述的形式出现。德里达是一位研究文学的哲学家,他将作为解构主义的奠基人而闻名于世,而解构主义是一种严肃而又富有争议的文本批评。

表面看来,福柯和德里达的辩论,尽管有时颇为尖刻,却根本不是关于疯癫,而是关于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然而,甚至参与辩论者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考虑到,他们争辩的真正对象是西方思想的本质:设想一种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完全重构是否可能?

我们看到,两位哲学家都有强有力的理由以坚守各自的立场。然而,离开他们正面冲突的炽热和光焰,并且在争论结束了很久之后,两位²主角沿着两条最终要交汇的道路前进。他们最终汇合的地方是权力和伦理的共同基础。

就权力而言,这样一种发展想来并不奇怪。毕竟,权力概念对于在追求严格理解过程中应用于各种社会现象的大多数理论构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尽管他们在公开不和之后对不同事物产生了兴趣,他们却都因为各自研究的事物而开始关注权力的重要性,这一事实本身原不应有什么特殊价值。事物发展的通常道路也会是这样。但是在这里,德里达作品中对权力的理解仅只是暗含的,而在福柯作品中,这种理解则十分明晰。这一情形并不说明什么,除非我们理解到以下两点:第一,福柯对权力的理解旨在与理解社会关系的传统形式决裂;第二,德里达作品中仅只是暗含的权力概念被福柯加以清晰化,而福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思想中几乎没有考虑到德里达。

当我们考虑伦理学问题时,说得更为具体一点,即康德的伦理学,一件看来更为不同寻常的事情在于,福柯和德里达都在他们各自轨迹的终点把对一条原则的肯定置于首要地位。此原则事实上是一条绝对命令,即人类永远不应该单单被当作手段来对待,正确行为的基础应该在人们遵行之原则的可普世化理念中寻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思想居然成为他们共同的终点,因为他们除了相互敌对之外,对西方哲学的主线也都抱有敌意和怀疑。就如同两位思想家从他们不同的观点出发,分别地投入到了同一个检验理性的活动中,并且最终在那里发现了无可否认的确定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回环。两位哲学对手在根本性的不和状态中离开了竞技场。他们按照不同的方向开展自己的工作,然而却在理论理解上未被识破的合作关系中重新碰头。

3 本书将努力勾画出这一无意识的合作关系史的大体轮廓。第一章介绍福柯关于疯癫史的理论,并不赘求对其第一部主要作品提供详备周至的阐述。笛卡尔的思想完全是将疯癫排斥在西方文明发展之外的同谋犯,我们会在第二章中审视这种观点。德里达在第三章中出现,他同福柯之间的哲学争论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第四章带我们离开他们之间的正面冲突,并通过在一些重要的解构主义文本和福柯论述监狱史的作品之间进行比较,以说明他们潜在的假定是如何开始向一处汇聚的。在最后的第五章里我们看到,他们两人都走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交叉

点上。

回环的圆形已勾画完毕。福柯和德里达的写作方式都很容易被看做是对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和整体理性等明显自得自满之理念的一种挑战,甚至是抵制。然而,福柯在后期实际上要求我们考虑希腊古典伦理学的当代价值。他最后的要求是,我们应该从过去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最终的分析很难把他归为理性的敌人。另一方面,德里达开始则是用发源于古希腊的古典哲学传统来对抗福柯。他这么做并不是要赞扬理性,而是为了使改造它的艰巨任务拥有更多的胜算。尽管他不遗余力地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然而我们发现在其奥德赛历险的终点,他却在撰文驳斥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作品和生活中令人搔首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者的做法,甚至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后现代多元论者的做法。

必须承认,到此为止,所有这一切都看似一个局部问题,只不过是当代哲学某一神秘幽晦领域中的一段有趣的插曲而已。本书就是要论证,事情远不止于此。来自一方的关于权力的实在主义与来自另一方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之间的交汇必然另有起因。这种起因常常以不甚明了的形式存在于被称作新社会运动的作品中,也存在于对官僚政治的新评价中,比如质量圈观念和反等级组织。总之,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界,一种既反乌托邦又非宿命论的新型社会力量正在渐渐形成。在这一正在浮现的景象中,对伦理学的最终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要当心出于无知的社会暴力,这是新实用主义社会秩序的代表们所可能犯下的暴力行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人性所固有的先决条件。

文明史上留下了新旧之间斗争的印记,抵抗也成为了一种近乎普遍的现象。总有某些利益因变化而遭受损失,因此也就有了反对变化的斗争。在他们的争论中,福柯和德里达互相误解了对方,都认为对方是这些利益的代表。在福柯眼中,德里达是一种理解形式的护卫者,这种理解形式始终恒定不变,总是在真理的名义下制造圣战,并形成专家和无知者之间神圣的分界;而在德里达眼中,福柯对既成秩序的隐蔽辩护是对乌托邦的一种虚伪承诺,一旦追求这样的幻象,就总是会导向幻灭,并

认命永远无法改变既已如此的世界。

但在他们的冲突之外,一个原本可能不甚重要的思想出现了,它以不同语言和不同方式在别处传播,认为等级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他们作品的主导精神告诉我们,这种终结虽然悦人心意,却也不应使我们高枕无忧。

第一章 福柯论疯癫

在福柯《疯癫与文明》^{〔1〕}一书中,交织着三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它们涉及关于疯癫的政治经济学^{〔2〕},疯癫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表现,以及疯癫和科学的关系。在随后的讲解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人们会质疑它们背后的历史研究的准确性,以及论证线索和阐述方式的说服力。但需要把握的重点是,尽管对于福柯的一些特定论述可以保留针对性的批评,却不可否认他强有力地论证了对精神疾病的当代理解是由复杂的文化、政治、经济和认识论历史塑造而成的这一事实。这是一个彻底超越了地理局限性的论证,虽然它几乎完全是限定在法国史的范围之内。即便是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会承认,福柯论述疯癫的著作,在过去的大约三十年间,为重新思考疯癫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理解现在就需要回顾过去的共同呼吁中,福柯的声音是最为响亮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通往过去的道路是受到管制的。通常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广为接受的历史真理,其作用就是把现在的各种做法合理化。打破旧习的历史学家扮演着政治性的角色。

〔1〕 米歇尔·福柯于1961年发表了《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癫史》(以下缩写为HF)。在1964年一个流行的法文平装本系列中,发行了大加缩减的版本。《疯癫与文明》(以下缩写为MC)是后者的翻译本(Richard Howard译),附带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原始文本的补充材料,于1967年出版。我赞同库辛(Cousins)和胡森(Hussain)(1984),他们认为缩减本是“原著苍白的翻版”。

〔2〕 关于翻译法文术语folie和fou的讨论,参见谢里丹(Sheridan)(1980),第16—17页。因为我不并关注疯癫、疯狂、痴呆、愚蠢等概念的细微区别,所以我选择使用一般性的词汇“疯癫”。进一步阅读,参见费尔曼(Felman),脚注15,第224—225页。

关于疯癫的政治经济学

6 麻风病在中世纪欧洲十分普遍。福柯的研究指出,单在 12 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有 220 个麻风病院。此时的欧洲有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为了把他们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需要提供大量的物资供给。对待麻风病的态度杂有恐惧、憎恶和非难的成分,但麻风病人却常常受到了很好的照顾(Midelfort, 1980, p. 253)。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麻风病人遭到斥责,并被排斥出正常社会,但监禁他们的流放场所却被给予了足够的物资,以便为疾病的受害者提供一个赡养机制。“捐赠给麻风病院的巨额财产”(MC, p. 4)证实了中世纪世界观里麻风病患者的文化意义。在福柯看来,麻风病人是中世纪社会的他者,是需要带着含有尊重意味的恐惧感来对待的重要感染源。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至今尚且不甚明确的一些原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的普遍性大为降低。看来社会排斥的做法起到了作用,尽管——与几个世纪后为控制瘟疫而采取的措施相比^[3]——彻底根除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在麻风病例的减少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到麻风病人的象征功能: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成为欧洲社会的新他者。第二个问题与变化相关,这种变化必然要发生在——我们可能称之为——关于排斥的经济学中。福柯将向人们展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以麻风病院的财富为代表的供养型经济结构并没有简单地被废除掉,并带有因任务顺利完成而在管理方面所感到的沾沾自喜。福柯论证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历时逾越两个世纪的紊乱过渡期。在一定程度上,性病患者继承了麻风病人的经济遗产和社会遗产。就如同福柯在谈到 16 世纪的发展时所指出的,“新的麻风病人,接替了前者的位置”(HF, p. 17)。但这既不是平稳的,也不是全面的过渡。尽管一些

[3] 米歇尔·福柯(1977),《规训与惩罚》(以下缩写为 DP),第 198 页。

医院开始治疗梅毒,我们可以视之为医学上由机构开展的同疯癫的第二波抗衡^[4],其他的医院几十年来则从未接纳此类患者。从16世纪中叶起,以弗朗索瓦一世于1543年所着手的调查为肇始,其目的是要“整顿麻风病院目前所存在的严重混乱”(MP, p. 4),欧洲社会就出现了对关于排斥的经济基础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位。新的被隔离者将是非生产性的贱民:穷人、罪犯、流浪汉和疯子。将如何解释这一新的焦点呢?

有必要确定时代背景。15世纪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扩张的时期,并且延续到了1600年之后。但到了1640年,这一扩张期走向终结,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有众多因素导致了这场影响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复杂经济危机,其中福柯提到了“减薪、失业、货币短缺”(MC, p. 49)。此外还可以加上诸如三十年战争之类军事冲突的耗费。常见的饥荒和瘟疫也影响了国家负担前所未有的高额税赋能力,同时也出现了人口统计上的收缩现象,与之形成对比,人口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此前时期的经济扩张。与经济衰退相对,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处于动荡之中,君主制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联盟,开始劫取封建贵族的权力,并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官僚机构。^[5]正如福柯所述,“这一专属于法国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机构,与其专制形式下的组织同时,很快地将其网络伸展到整个法国”(MC, p. 41)。

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欧洲文化的总体态势和价值观也开始发生改变。尽管如韦伯所提示(1930, p. 177),在中世纪的行乞体制下存在着某种对贫穷的赞颂,但到了17世纪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行乞遭到强烈谴责。穷人和流浪者有时被用作奴隶劳工,比如在巴黎的下水道中,或者在西班牙的航船上。^[6]在其他一

[4] 任何对疯癫治疗史的全面论述都要从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5)开始,随后延伸一千三百年直到萨勒诺(Salerno)(公元9世纪)的医疗机构。概览,参见尼曼(Neuman),第一章。

[5] 参见博什内(Porshnev)和穆斯聂(Mousnier)之间关于17世纪法国政治权力的阶级动力的重要辩论(辩论摘要的译文出现在考文西[Coveney]著作中,1977)。不管两位权威人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他们都认为,资产阶级处于当时政治舞台的中心。

[6] 路斯·派克(Ruth Pike)(1982,第199页)已经证明,在西班牙,只有贫苦者在受着“可以为自身利益而利用罪犯劳力”这样的国家新兴思想的冲击。

些时候,他们要么是非正式地要么是迫于政府法令被赶出城市。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令人绝望的社会境况创造出了大批的乞丐和流浪者,他们都被看作是政治问题,福柯或许会称之为“管控”问题,是对新生的劳动伦理的侮慢。

随着欧洲专制国家管理范围的拓展,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实践中,教会都从它先前致力于援助穷苦者的角色中向后退缩。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的教诲,无论其是否被乐意地接受了,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回应,因为贫穷被当成了一个世俗问题。福柯这样解释到:

- 8 贫穷不再被限于屈辱和光荣的辩证范围内,而是被置于混乱与秩序的关系中,围绕它的是罪恶。并且,自从路德和加尔文以来,贫穷带上了永恒惩罚的印记,在由国家掌控慈善事业的世界里,它是一种自满,也是对国家一切正当工作的冒犯。^[7] (HF, p. 70)

经济萧条改变了对待贫穷的态度,教会事实上的退缩、新的劳动伦理的出现,以及国家管理权限的拓展,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引领了福柯所谓的“大禁闭时代”的到来。如他所言,这是“一个欧洲具有的普遍现象”。这些因素解释了英格兰救济院运动和教养院——德国称之为“监狱”。但福柯的主要关注点在法国,他指明了一个特别时刻:1656年颁布的法令要求在巴黎建立综合医院。表面看来,综合医院的建立仅仅是对先前存在的一些医院的行政性重组。在国王的法令下,所有这些地方都用来收容巴黎的穷人。法令的第11款特别指出,此法令适合于所有的贫苦者,“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如何,即健壮还是伤残,患病抑或康复,可医治或是不可救药”(MC, p. 40)。在1657年5月14日的星期一,也就是第二道法令颁布的次日,民兵开始搜捕乞丐,并从此把他们赶进了综合医院的各个机构。这次在赤贫的污水中进行的专制主义大搜捕,仅在巴黎一个城市,就至少网罗到6000人:疯子、

[7] 认为福柯忽视了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向疯人院的转变(参见西季威克[Sedgwick], 1982, 第134页),这是错误的。因为,关于教会就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贫困问题上所担当的角色,福柯在他讨论针对教会的压力和教会内部渐渐转变的态度时,确实论述了这种转变(参见HF, 第68—69页)。

流浪汉、罪犯,和所有的不正常人等。贫穷是非生产性的游手好闲者的道德疾病,也是送他们去医院的充分必要条件。到了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有 32 家这样的医院。

这些地方的管理章程使得它们具有了真正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被创建为一种完全自主的司法领地。1656 年的法令提到了“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并且规定,只要是综合医院主管视为必要的条例,与之相关的上诉一概不予受理。于是,这些机构中的被禁闭者在身体上和行政管理上都被排斥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外。疯癫者发现⁹他们的家就在这些分散的机构中,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因为他们是非生产者。

关于医院体制的性质有一些争论。福柯准确无误地断言说,曾经有过让这些机构的被禁闭者参加劳动的尝试。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同时也对穷苦者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动荡性的社会政治群体而给予应有的关注,福柯才认为大禁闭不仅仅是针对 17 世纪欧洲危机环境下的连锁情形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他写道:

在这些危机时期之外,禁闭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问题不再仅仅是禁闭无业者,而是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让他们为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转换是很明显的: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它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在严重失业时期,则它可以收容游手好闲者,并发挥防范起义和动乱的社会保护作用。(MC, p. 51)

综合医院的象征意义在于对被禁闭者的极端排斥之中。福柯的疯癫史根基于下述思想,即人们可以追踪记录社会他者所具有的各种形态的历史,并且能够通过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说明,特定的社会群体是怎样在不同的时代占据了他者的位置。然而,贫穷和麻风病在它们不同的时期中作为社会他者所处的象征性对等关系并不是牢固确定的。尽管总是不甚成功,但还是有不少试图让医院的被禁闭者参加工作的努力。这些尝试几乎不能证明穷人被惯例性地排斥在社会之外。必须补充一点,把流氓无产阶级排斥出社会的努力绝对不是全面有效的:在巴黎的大街上,贫穷现象随处可见,在 18 世纪的法国,下层阶级所担当的

政治颠覆性角色也被完好地记录在案(Marx, 1973)。在那时,非生产者只具有部分的他性。实际上,综合医院开始被看做是“特权游手好闲者”的场所。但是,为社会福利做贡献的劳动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非生产者不甚有效的幽禁证实了排斥过程的持续实用性,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禁闭的异质过程,自17世纪起,疯癫者才被视为现代社会确凿无疑的他者。疯癫者没有能力为医院的经济运作做出任何有条理的贡献,正是这一点为结束象征意义的转让铺平了道路。〔8〕

这些禁闭场所到底是什么模样呢?通过引证官方记录和同时代人的报告,福柯描述出了一副肮脏而又苦楚的黑暗画面。这些医院很难与监狱区别开来。它们是惩罚和道德谴责的系统,这一事实在福柯记述此系统中对性病患者的治疗时加以特别强调(HF, pp. 97—101)。福柯评论说,疯癫者被漠然地置于监狱和综合医院之间,看到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这两个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所关心的都是如何消解威胁社会秩序的因素,无论这些因素是来自发疯者的凶残、犯罪暴力,或者是非道德的骚乱。宽容、改造和治愈并不是专制主义辞典中的中心条目。

但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传统,一个医疗和疯癫相互之间并不陌生的传统。这一传统沿袭了“修道院监护照料的灵感,以救赎和改造与麻风病院的阴森模式形成对立”(Midelfort, 1980, p. 256)。米德福特(Midelfort)认为这些做法的意义被极大地低估了,其实不然,它们不过是幽禁的前奏而已:

古典时期的疯癫世界并非完全一致。冒昧地认为疯癫者被纯粹地等同于权力机构中的囚徒来对待,并没有错误,而是不够全面。其中有些人有着特殊的资格。

在巴黎,有一个医院保留着对发疯的穷人进行治疗的权利。在

〔8〕 认识到福柯作品的价值并非完全建立在历史细节的精确性之上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精确性仿佛是莫奎尔(Merquior, 1985, 第27页)所提倡的,他说“福柯历史画面中的几个关键假设”遭遇了釜底抽薪的对待。福柯的原著要远远比当前批评家所设想到的更为微妙和多面化,很明显,他对与疯癫相关联的禁闭之意义的追寻,拥有超出历史依据的内容,它既是文化的和哲学的雄心,也是历史性的努力。

一定程度上,人们依然期望治愈这些疯癫者,他们可能被接进主官医院。那里提供惯常的治疗手段:抽血、导泻和洗浴。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因为这个主官医院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为疯癫者预留住处……但是,如果几周后这些患者仍然没有痊愈,男性将被遣送到比塞特尔,而女性则被送至拉萨尔佩特利耶。总括起来,对于整个巴黎的居民和周围地区,一共有 74 个为照料疯癫者而预留的住处——这 74 个住处构成了通向幽禁的前厅,这种幽禁恰好意味着一种与疾病、治疗和最终治愈之世界渐行渐远的堕落。(HF, pp. 125—126)

于是福柯承认,与广泛的禁闭现象同时还存在着一个社会文本领域,其源头在古典时期之前,可以回溯到希波克拉底,那里有关于治疗疯癫的论述。我们在本章专门论述疯癫与科学的部分将会看到,他对此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但是这一边缘传统的存在并不能转移论题的重心,即禁闭的源起是经济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的。麻风病的消失导致象征序列上出现了空缺,禁闭为疯癫填补此空缺创造了背景。

在法国综合医院长达 150 年的历史中,贫穷渐渐地从绝对的道德谴责之下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劳动阶级成为了国家财富所必需的经济元素。贫穷不再被看做是游手好闲的符号和社会动乱的萌蘖。而是成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东西。福柯写道:

在重商主义经济背景下,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的贫民没有任何位置:他们游手好闲、四处流浪、无人雇佣,因此其唯一归宿就是被禁闭,这是一种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流放他们的手段。现在,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们就在国家中重新获得了一个身份。(MC, p. 230)

实施禁闭的医院开始被看成是,从经济上来说,不合时宜而且缺乏理智的慈善机构。获取财富的奥秘在于剥削穷人,而不是幽禁他们。

福柯曾竭力追问,是什么使得综合医院内所有的被囚禁者转聚成了一个范畴。疯子、穷人和道德败坏者的共同之处在哪里?他回答说,他们都是处于专制主义政治和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秩序界限之外的人。

- 12 禁闭是对这些状况的一种伦理回应,这种社会强制行为造就了 20 世纪晚期一个令人费解的范畴统一体。在 19 世纪初,随着禁闭时代的结束,一种新的话语出现了,即经济学话语。现在,贫穷将会被用数字性而非伦理性的术语来描述。在大禁闭时期之中和之后,虽然这些话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对贫穷的理解和处理都依然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

禁闭之外的恐惧也以不同形式浮现出来。尽管把各种工作引进禁闭场所的努力无疑是失败了,但这些尝试确实起到了把疯癫者与其室友伙伴渐次分开的作用。在被禁闭人员中划出了一道分界线的并不仅是对工作的广泛需求,这些场所的人文地理状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 18 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日益高涨的抗议:那些不是疯子的人不愿与疯癫者沆瀣为伍。福柯写道:

疯癫渐渐地变成了被禁闭者所恐惧的幽灵,是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是理性被击溃并陷入缄默的写照。不久,米拉波就认识到,这种对待疯癫的薰莸杂处的可耻行径是一种微妙的暴力工具,也正好体现了专制主义的野蛮和嚣张。(MC, pp. 224—225)

- 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是法国 18 世纪的著名政治人物,但因其不羁的生活作风而曾经遭受监禁,他认识到疯癫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禁的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结果。那些被逐出社会并抛入完全降格了的环境中的人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当理性赖以立足的所有社会支撑物被一概抽空时该如何保持理性呢?对于综合医院和作为整体的禁闭系统而言,疯癫并不是一个需要由看守和囚犯来对付的偶然问题。它是这一作为整体的系统的产物和本质,也是一种骇人的反讽和隐匿的伪善,因为治疗方法的再度人性化是建立在将疯癫确认为疾病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种做法,福柯在其作品中反复申述,是人类科学得以兴起的条件,也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超然态度和客观性面纱掩盖下的认识论的发展发挥了政治作用,即把先在的政治背景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消解。
- 13

巴黎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与比塞特尔和拉萨尔佩特利耶两处閤阁相接者,或许并不能有福柯关于疯癫如何得以传播的理解。但他们知

道,这一切都极为不妙。福柯所谓的“大恐惧”出现于18世纪中叶。那时,人们对于据说是来自于禁闭场所的神秘疾病感到非常害怕。福柯用整整一个章节解释说,这就是人们对于禁闭系统的复杂反应。首先,它是对禁闭做法的谴责,因为滞居一处必然滋生疾病。即便是在18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流动是群居社会的内在条件。于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又加上了它对于人性憎恶滞居的强调。其次,它是对于保护的呼吁:禁闭造就了不可预知的暴力和分裂性的疯狂形象。典型的疯子不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满口胡言的神经病。第三,这是对医疗职业的召唤,其从业者将作为哨兵出现,而不是仁慈怜悯的人道主义者。

但是,令人惊愕的是,禁闭的全面意义并没有在此否定性的平面上被穷尽。就在这场道德惶恐中,浮现出了一种新关系;禁闭场所与世隔绝的暴乱狂悖在其围墙之外也起到了连接恐惧和欲望的新作用。福柯写道:

施虐狂(Sadism)并不是最终送给那与厄洛斯(Eros)一样古老的性爱的名称。它是出现于18世纪末的大规模文化现象,并且构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嗜欲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成心灵的谵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在被封堵并沉寂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出现,施虐狂也正是出现于此时。(MC, p. 210)

作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个失败,禁闭迟早要结束。但在围墙的内外两侧,它都塑造了新的疯癫形象。就是在此背景下,福柯说我们必须了解皮内尔和图克的介入。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是法国医生,他于1793年成为比塞特尔的主管,不管是在此处还是在拉萨尔佩特利耶,他都因为在管理疯癫者方面引入了更为人性化的体制而颇负盛名。英国人塞缪尔·图克(Samuel Tuke)在约克郡成立了休养所,在那里,精神病患能够在一种静谧和沉思的宗教氛围中被治疗并治愈。二人在精神病医学的标准历史中被用一种凯旋式的口吻描述为心理诊所的现代创始者,他们构成了驱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关注的目标,也就是疯癫本身,